



■ 邹兆辰著

英雄的悲

李秀成心理分析

卷之三

及不隨心記在心上大暑得日
墮一片土心宿就至未四時
天正十四年夏其在家兄

王應立詞卷之二
傳下

病死者七日置魂自安

■ 邹兆辰 著

英雄的悲劇

李秀成心理分析

牛承大人署廣日食資多又
此至訖向來情是日述一大
深事分明定是以再用鑿心之計
三應立司基之計、醉

教得其去日起義之日、招集
反革命、記在心之大黑官寫口
筆一片之心寫就、並未問他、
天至士日之末載書其在家兄

後兄是其前母所生、滋旁全、
本來本來書林木裏、傳道聖經
說元於家種田、送走金在、家讀書、
病死者七日、置魂自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雄的悲剧：李秀成心理分析 / 邹兆辰著.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7

ISBN 978-7-5656-3062-0

I . ①英… II . ①邹… III . ①李秀成(1823—1864)—人物研究
IV . ①K825. 2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60607 号

YINGXIONG DE BEIJU

英雄的悲剧

——李秀成心理分析

邹兆辰 著

责任编辑 欧家作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48

电 话 68418523(总编室) 68982468(发行部)

网 址 www. cnupn. com. cn

印 刷 三河市博文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330 千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序

梁景和

心理史学起源、发展于欧美，并影响到中国史学，可视为当代中国史学的新视域或新流派。

19世纪末向德国传统史学派别兰克学派提出质疑的发起人是卡尔·兰普雷希特。他提出了“历史学首先是一门社会——心理学”^①。他的《德国史》就是运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撰写的一部著作。狄尔泰是德国最早使用心理史学方法的历史学家，他的《黑格尔青年时期的历史》就是以青年黑格尔的心理分析为个案的典型范例。李凯尔特在其代表作《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中，专门以“历史学与心理学”为题，探讨了心理史学的特质。法国年鉴学派第一代代表人物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都是较早强调心态史的学者。吕西安·费弗尔的《马丁·路德：一个命运》，探讨了16世纪德国社会的集体心理。马克·布洛赫的《创造奇迹的国王》运用心理学的方法，揭示了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的社会心态。心理史学的第一座高峰是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的研究不同于法国年鉴学派。如果说法国年鉴学派的心理史学主要是以史学为主题而借助于心理学的分析方法的话，那么弗洛伊德则是以心理学为主体，把心理分析理论应用于历史研究的具体实践。弗洛伊德的《童年的回忆——达·芬奇》和《托马斯·威尔逊：美国第二十八届总统的心理研究》是心理史学的典范之作。由于弗洛伊德运用的心理分析比较专业和规范，使得心理学与历史学真正结缘。美国“新史学”运动的代表鲁滨逊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受弗洛伊德心理史学的影响，在《新史学》中提出用综合的多种因素的观点来分析历史，其中就包括心理的成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与法国心理史学相对应的学术研究重镇，五六十年代，很多历史学家对心理史学进行了有益的探索。70年代，美国在这一学术领域先后创办了

^① [英]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姚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6页。

专门的学术刊物，心理史学成为当时最活跃的学科。哈佛大学教授埃里克·埃里克森是心理史学的又一座高峰。他的《青年路德传》《甘地的真理：非军事暴力主义的起源》等多部专著为新弗洛伊德心理史学奠定了基础。^①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受到了欧美心理史学的影响。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中对心理史学有深刻的认识和阐述。朱谦之较早注意到史学研究中“心理的方法”问题，认为社会越进步，心理因素的影响就越大。^②何炳松主张历史学科是多学科、多方法的综合研究，就是“必待心理学与自然科学、经济学能通力合作，不背道而驰，以解决此问题”^③。胡秋原在《历史哲学概论》^④中专门对“心理史释”做了论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史学界把西方的新史学理论和方法介绍到国内，其中就包括美国的心理史学和法国的心态史学。在介绍西方心理史学的过程中，罗凤礼、邹兆辰、朱孝远等中国学者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如罗凤礼的《西方心理历史学》（《史学理论》，1989年第1期）和《论弗洛伊德的历史观》（《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3、4期）；邹兆辰、郭怡虹的《西方心理历史学理论和方法简析》（《世界历史》，1987年第4期）；朱孝远的《现代历史心理学的产生和发展》（《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等。这一时期，国内出现了研究中国心理史学的理论著述。如彭卫的《试论心理历史学的主体原则与理论层次》（《史学理论》，1987年第2期）和《历史的心镜——心态史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胡波的《试论历史心理学及其研究对象》（《学习与探索》，1988年第2期）和《历史心理学的价值和意义》（《广东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等。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借鉴心理史学的方法或以心理为切入点进行研究的学术成果，如章开沅的《离异与回归》（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周岩的《百年梦幻——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历程》（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程漱的《晚清乡土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乐正的《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李文海的《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等。

邹兆辰教授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较早关注、介绍、研究心理史学的主要学者

^① 参见陈曼娜：《二十世纪中外心理史学概述》，《史学史研究》，2003年第1期；朱孝远：《现代历史心理学的产生和发展》，《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

^② 朱谦之：《历史哲学》，上海泰东图书局，1926年。

^③ 何炳松、郭斌佳编译：《西洋史学史》。转引自胡逢祥、张文建：《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大出版社，1991年，第345页。

^④ 胡秋原：《历史哲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47年。

之一。20世纪80年代至今三十多年来，他先后发表过多篇有关心理史学的学术论文，诸如《西方心理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简析》（《世界历史》，1987年第4期）、《历史问题也是一个心理问题——普列汉诺夫关于社会心理问题的理论在唯物史观中的价值》（《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4期）、《五四运动中的社会心理与爱国精神》（《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当代中国史学对心理史学的回应》（《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1期）、《新时期以来对中国史学影响较大的几个西方史学流派》（《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近年来我国心理史学发展趋势》（《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4期），等等。这些论文不但介绍了心理史学的学科特征以及理论与方法，阐述了西方心理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以及国内心理史学的实践与发展，而且还有他本人运用心理史学理论方法进行史学研究的实践成果。邹兆辰教授在心理史学方面做出的贡献值得我们敬重和景仰。

这二三十年来，心理史学给予了中国史学诸多有形或无形的影响。对于心理史学，我完全是个外行。但在不知不觉中，我似乎对非概念的心理史学也有某些懵懵懂懂的感觉，这大概与我关注社会文化史有关。1991年，我参加辛亥革命80周年全国青年学术研讨会，会后我写了一篇会议综述，其中提道：“会议提交的社会文化史论文的内容主要包括：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心理……”，在介绍有关研究社会心理的论文时提道：“有的论文指出，清末民初政治变化与反满排满和思安厌乱心理有关，反满情绪导致清朝灭亡，思安厌乱心理又使革命半途而废，任何社会变革的深度与广度和社会心理变化的质量成正比。……有的文章指出，辛亥革命时期社会心理的变化，是近代以来，尤其是戊戌变法以来西方现代意识不断渗入和资产阶级启蒙教育的结果，铸成一种人心思变的社会环境，产生一种与民主共和相适应的新价值尺度与行为准则，成为辛亥革命爆发的重要社会心理要素。”^①1989年，我发表了《清末社会习俗变化的历史局限》^②一文，文章认为变态审美心理、恐惧心理和逆反心理是阻碍社会习俗变革的重要因素。1992年，我的论文《民族心理与民族文化探略》^③，探讨了民族心理与民族文化、民族心理与社会进步的关系问题。1999年，我发表了《清末国民性批判》一文，^④阐明

^① 梁景和：《辛亥革命80周年全国青年学术研讨会关于社会文化史问题的讨论述评》，《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② 梁景和：《清末社会习俗变化的历史局限》，《史学月刊》，1989年第2期。

^③ 梁景和：《民族心理与民族文化探略》，《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增刊。

^④ 梁景和：《清末国民性批判》，《清史研究》，1999年第3期。

国民性问题与民族心理问题是有关联的。1999年，拙著《清末国民意识与参政意识研究》^①出版，其中探讨了国民意识产生、文化启蒙和参政意识的产生与发展，这些也与民众的心理有关系。我的学术旨趣是在社会文化史领域，我认为所谓的社会文化史“是研究社会生活与其内在观念形态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②，“一个社会的人们为什么要这样生活，是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决定的；一个社会人们的生活变化引起了哪些思想观念的变化；由于新思想观念的影响使一个社会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一切都是社会文化史要研究的问题”^③。可见，社会文化史注重观念形态问题，也就不自觉地要去关注社会心理问题。后来，我发表了《社会生活：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文中说：“同一个个体，在不同的年龄段，个体的生活观念是有变化的。中国古语道：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就是讲个体在不同年龄段上不同的生活观念和生活状态。……同一个个体在不同的年龄段观念尚且不同，那么不同的个体在不同的年龄段观念的差距就可想而知了，所以代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域，是研究社会文化和比较研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④这里也谈到了个体的心理问题。其实改革开放以后，史学界不自觉地会受到心理史学的影响。我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记得1985年下半年，导师李侃老师为我们上“中国近代文化史”课，有一次讨论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晚年出现向传统文化回归的现象，李侃老师在解释诸多原因的时候，特别强调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失败后，社会混乱的现实给很多人造成心理上的影响，可能会引起一些社会文化人的思想变化，所以出现了回归现象。李老师从人的心理变化方面进行的解释是有一定道理的。2007年，我在为博士研究生授课时，与周宇清、钟海涛、崔萌、张美丽几位博士生也专门讨论过心理史学和心态史学问题。我现在逐步体会到：“历史问题也是一个心理问题”的命题是值得深思的。

2013年1月18日，我拿到邹兆辰教授的《英雄的悲剧——李秀成心理分析》一书的打印稿，渴望一读。早在20世纪80年代，邹兆辰教授就想选择一个人物，尝试用心理史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当时他注意到罗尔纲先生《忠王李秀成自

① 梁景和：《清末国民意识与参政意识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

② 梁景和：《关于社会文化史的几个问题》，梁景和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31页。

③ 梁景和：《关于社会文化史的几个问题》，梁景和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31页。

④ 参见梁景和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00页。

述校补本》，认为可以利用李秀成自述的资料，对李秀成进行心理分析。由于种种原因，当时这项工作搁置了。多年来，邹兆辰教授由于对心理史学的执着以及长时间的积累和思考，前几年他在完成了手头其他科研任务后，又重新开始了“李秀成心理分析”的科研工作，并在短时间内完成了这项科研任务。眼前这部书稿是尝试运用心理史学方法进行人物心理分析的专著，是一部具有代表意义和很高学术价值的心理史学专著。阅读此书，我觉得这部著作的研究和撰写有如下几个特征：

第一，从全书结构上看，体现了心理史学的特征。该书稿在结构上共有六大部分，分为绪论和五个篇章。其中第二、三、四章是全书的主体部分，充分体现了心理史学的特征。第二章讲述的就是李秀成在整个太平天国运动中的心路历程，从“迷迷蒙蒙”参加太平军，到李秀成对“天国”的看法和印象，再到为“天国”建功立业和支撑残局以及如何面对国破身亡之绝境，全章刻画了李秀成在太平天国十四年的内心冲突和心灵走向。第三章专门叙述李秀成与洪秀全和曾国藩之间的心理互动。在李秀成与洪秀全共谋天国大业的恩恩怨怨中，李秀成如何初识了洪秀全，如何得到天王的信任和重用，两人的心间隔阂又如何产生和发展，李秀成内心对天王的知恩忠诚与责备悔恨的矛盾心境为何始终交织在一起，作者对此给予了心理史学技术方法上的画龙点睛。李秀成与曾国藩之间的心理互动中，反映了李秀成对曾国藩的认识和态度以及对清政府的期许，同时也可以看到曾国藩对李秀成及在对李秀成的处置上的复杂心态。第四章重点阐述李秀成的人格特征，一方面从外国人的视角看李秀成的形象、性格和气质；另一方面又从李秀成本人的立场剖析了他自己的知识、才能和人性。通观这三章的主体内容，彰显了心理史学的偏好和视点。

第二，从史料选材上看，体现了心理史学的特征。该书稿依据的最基本的史料是《李秀成自述》。而这个《自述》，能充分反映李秀成的内心活动以及可供进行心理分析的典型素材。正如邹兆辰教授所说：“《李秀成自述》是一个可以进行心理分析的绝好材料”，“这份三万多字的自述，是李秀成在囚禁他的木笼中，用毛笔一字字写成的。……供词虽经曾国藩在个别地方有所改动，但透过影印的原件，仍然可以看到它的真面目。《李秀成自述》的最大特点除了系统地保存了太平天国的历史和他本人的经历外，还真实地记录了他在被囚时的心理状态”。该书稿以《李秀成自述》为基本史料，从《自述》的字里行间中能够看到李秀成对个人心理、群体心理现象的一些描述，这份《自述》为邹兆辰教授进行心理分析创造了条件。

第三，从分析论证上看，体现了心理史学的特征。该书稿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在叙述完史料之后直接用“心理分析”标题来进行心理论证。有些心理分析确有精妙之道。比如邹兆辰教授对李秀成“愚忠”的心理分析就比较典型。邹兆辰教授认为：洪秀全与李秀成之间一直存有心理隔阂，因为李昭寿降清后曾劝李秀成也降清，洪秀全得知此事就开始防备和怀疑李秀成了，而且设法拒绝李秀成的军事主张，限制李秀成作战的主动权。李秀成对洪秀全也多有责备和怨恨，埋怨洪秀全不理政事、任人不专、尽信天灵、不由人奏。两人之间已经如此隔膜，但李秀成在行为上还是选择了对洪秀全尽忠到底的一条路，不但一切听从洪秀全的指挥和调遣，而且把母亲和家眷一起押给朝廷做人质。李秀成如此作为，邹兆辰教授认为这是由李秀成感恩与“愚忠”的思想和心态决定的。洪秀全启用李秀成后，把他原来的名字李寿成改为李秀成，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却非同小可。太平天国诸王的名字都需要避讳，洪秀全却把李寿成的名字改为李秀成，不避自己名字的讳，足以表明对李秀成的器重。后来洪秀全还把他亲自写的“万古忠义”四字的旗子送给李秀成，并封他为“忠王”。李秀成对洪秀全的恩情是念念不忘的，并一直抱有“尽我愚忠而为”的理念，把臣子对君主尽忠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正是在这样的愚忠心态下，当洪秀全死后，幼主继位，李秀成又把愚忠的对象转移到洪秀全的儿子身上。虽然幼主是个孩子，却是洪秀全的骨血，所以李秀成要拼死保卫幼主。正是他的愚忠心理，使他没有选择拉出一支队伍另辟新路，去做“石达开第二”。再比如，邹兆辰教授通过对李秀成向善心理的分析，来理解李秀成的一些所作所为。邹兆辰教授认为，李秀成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军事将领，早应该造就一副铁石心肠，但他是个普通人，也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他对自己手下变节的将领，要通融保住他们的性命；对于被俘的清朝官员，给予留去自由的选择。李秀成一生当中做过的类似事情不胜枚举。邹兆辰教授分析，这与李秀成“生各扶其主，两家为敌，死不与渠为仇，此出我之心愿，悉不忍加刑，故而为此也”的心态有关，他的“出我之心愿”恰恰反映了李秀成人性中向善的一面，体现了他的慈悲心肠。下面一例，我们能够看到邹兆辰教授对曾国藩的心理是如何分析的。清军攻破天京，活捉李秀成，这是湘军的大功。把李秀成送到北京“献俘”，也是曾国藩向清廷显功的好机会。但曾国藩改变初衷，决定在南京就把李秀成杀掉，这是为什么呢？对此邹兆辰教授做了心理分析：曾国藩与其幕僚赵烈文都先后见过李秀成，他们都认为李秀成“甚狡，不宜使入都”。所谓“甚狡”，是说他不是那种没有头脑的蠢贼。他们知道李秀成对太平天国的兴衰成败有很清楚的认识，对清廷应如何收拾残局也有一番看法，特别是李秀成提出了“夷务不靖”的看

法，主张“防鬼反为先”，如果让这样一个有头脑的人进京，在朝廷审讯中，说不定会说出什么对曾国藩不利的话。邹兆辰教授分析的正是曾国藩内心的困惑、焦灼和纠结所在。该书稿中类似的心理分析比比皆是，在此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阅读这部书稿的过程，就如在听故事，看小说。书稿的文笔顺通畅达，一气呵成。作者对史料和史实掌握得清楚，对学术界李秀成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也很熟悉。特别是书稿的先史料后分析的书写结构给读者提供了深入理解和思考的空间。当然任何一部书稿都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该书稿也是如此。一方面由于书稿结构和多角度分析的原因，有些事实和史料前后出现了多次重复；另一方面，对历史问题进行心理分析，这是跨学科并运用新方法的体现，反映了学术研究的进步趋向，但有些历史问题还要对心理原因的背后因素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才会令人感到入木三分。当然这也可能不是心理史学的任务了。不过，瑕不掩瑜，这是一部值得充分肯定的史学著作。

其实研究心理史学有相当大的难度，要求的条件很高，不是轻易能够做到的。研究者不但要有史学专业的基础，还要有心理学的知识和运用心理学方法的能力。邹兆辰教授长期从事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有高深的专业理论水平，他又较早就关注着国内外心理史学的发展和走向，阅读了大量的心理史学方面的著作。更能可贵的是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邹兆辰教授就参加了中国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举办的心理学讲座，他坚持利用业余时间听了两年多的讲座，并通过考试取得了合格证。邹兆辰教授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于 80 年代开始思考利用李秀成的自述资料，对李秀成进行心理分析。邹兆辰教授进行李秀成心理研究还有其从事心理史学的实践基础，他 1989 年发表过《五四运动的社会心理与爱国精神》。2001 年出版了《新时期中国史学思潮》(合著)，2011 年出版了《变革时代的学问人生——对话当代历史学家》和《为了史学的繁荣——对话当代历史学家》，这三本书是他与当代历史学者的心灵沟通和对话，这里就有心理史学方法的运用，也是具有心理史学性质的成果。所以现在看来，邹兆辰教授出版一部《英雄的悲剧——李秀成心理分析》是有其自身学术专业基础的，是符合自身学术发展逻辑的。真诚希望有更多的心理史学的成果面世，为中国史学的繁荣增辉。

以上所述只是我个人的一点浅见，可能说了很多外行话，好在我是抱着学习的目的，在此向方家请教了。

目 录

绪 论 《李秀成自述》的历史命运 / 1

- 第一节 对《李秀成自述》的历史评价 / 3
- 第二节 政治风云下的《李秀成自述》 / 7
- 第三节 《李秀成自述》重新被提起 / 13
- 第四节 换一个角度来看《李秀成自述》是否可行？ / 15

第一章 李秀成的最后二十一天 / 23

第二章 李秀成在太平天国运动中的心路历程 / 35

- 第一节 参加太平军：“迷迷朦朦而来” / 37
- 第二节 李秀成眼中的“天国” / 44
 - 一、永安突围先败后胜的心理分析 / 44
 - 二、天国封王并进驻南京 / 45
 - 三、关于定都南京的背景 / 46
 - 四、李秀成的“天国印象” / 48
 - 五、“天京之变”的深层次原因 / 49
- 第三节 为天国建功立业 / 52
 - 一、勤劳学练，上司见爱 / 52
 - 二、与陈玉成共同作战，保固桐城有功 / 54
 - 三、在东王的指挥下，解除天京之困 / 57
- 第四节 支撑残局 / 61
 - 一、反思败因 / 61

- 二、朝中无将，奉命调度朝政 / 63
- 三、枞阳会议，组织反击天京之围 / 65
- 四、奇袭杭州，以救天京，打破江南大营 / 68
- 五、收服苏浙，建立基地 / 72
- 六、主动出击，上攻湖北、江西，下攻浙江 / 75

第五节 面对国破身亡 / 82

- 一、安庆失守，陈玉成被杀，湘军逼近天京 / 82
- 二、解救天京失利，再进皖北 / 85
- 三、浙江遭遇洋兵助清，苏州叛将献城 / 88
- 四、在天京的最后困守 / 90
- 五、忠与不忠的考验 / 93
- 六、天京被攻破，携幼主突围 / 95

第三章 在洪秀全与曾国藩之间 / 99

第一节 李秀成与洪秀全的恩怨 / 101

- 一、初知洪秀全 / 101
- 二、得到天王的信任 / 103
- 三、矛盾的产生与发展 / 107
- 四、危亡之下的君臣矛盾 / 112
- 五、李秀成对洪秀全的态度 / 120

第二节 李秀成与曾国藩之间的心理互动 / 127

- 一、李秀成对曾国藩的态度 / 127
- 二、李秀成对清朝的期许 / 132
- 三、曾国藩在处理李秀成问题上的心态 / 136

第四章 李秀成的人格特征 / 145

第一节 外人的观察 / 147

- 一、形象 / 147
- 二、性格 / 150
- 三、气质 / 152

第二节 自我的剖析 / 155

- 一、知识文化、军事才能 / 155

- 二、崇尚天意 / 159
- 三、铁胆忠心对主 / 161
- 四、保民为乐 / 167
- 五、人性彰显 / 170

第五章 罗尔纲考证《李秀成自述》的方法研究 / 175

- 第一节 师从胡适，精研考证 / 178
- 第二节 对《李秀成自述》真伪的考证 / 180
- 第三节 《李秀成自述》考证的基本内容 / 182
- 第四节 《李秀成自述》考证的基本方法 / 195

附 录 / 201

- 历史问题也是一个心理问题——普列汉诺夫关于社会心理问题的理论在唯物史观中的价值 / 203

西方心理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简析 / 214

五四运动中的社会心理与爱国精神 / 227

当代中国史学对心理史学的回应 / 237

历史研究与心理分析 / 253

探究历史背后人的心理——心理史学：深化历史解释的重要方法 / 273

后 记 / 275

绪论

《李秀成自述》的历史命运



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前八十年的史学研究，是在极其复杂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下进行的。这种环境有时会风云骤变，令一些人难以捉摸，不知所措。也有一些人，“梅花欢喜漫天雪”，在这风云变幻的时代，愿做时代风云的“弄潮儿”，愿借这种机会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在特殊政治时代的学术探究中崭露自己的头角。于是，学术研究成了这种政治风云下一些人捉弄于股掌间的可怜牺牲品。然而，一旦政治风云的旗帜变化后，这些被损害的学术研究能够自动地归复到科学的轨道上吗？非也！事实证明，这种学术的归复不是简单地把黑的重新说成白的那样简单，它往往要经过一个十分复杂的再认识过程，要从一个新的高度来进行科学的审视，才能把那被损伤的学术研究重新恢复到科学的路径。

让我们以《李秀成自述》的历史命运为例，试图探究百年来学界对其评论的时代轨迹，并试图了解史学与历史、政治、社会等关系的内在逻辑。当然，这里所说的《李秀成自述》的历史命运，不仅仅是针对这个文献资料本身，也涉及对书写这个自述的主人公的一生历史活动及其心理变迁的探究。

第一节 对《李秀成自述》的历史评价

《李秀成自述》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那一年（清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天国的重要将领忠王李秀成保护洪秀全之子幼天王从天京突围后，在途中被抓获，押解到清军大营，经镇压太平军的清军统帅、两江总督曾国藩审问后，在被关押的木笼中用九天时间写出的一份供词。供词被曾国藩删改、抄录后上报给清廷，而原稿却保存在他的家中，秘不示人。近百年之后的1963年，曾国藩的后人将原稿在台湾世界书局影印出版，世人得以看到这份供词的真实面目。但是，史学工作者对这份供词的研究与评价却从20世纪初就开始了。

最早提到这份自述的价值的是梁启超。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朝的统治还在最后延续，新史学的倡导者梁启超写了一部《中国四十年大事记》，这部书又名《李鸿章》，是为李鸿章作传的书，写到太平天国，就涉及李秀成。他有一番很长的评论，不妨让我们摘引如下：

李秀成真豪杰哉。当存亡危急之顷，满城上下，命在旦夕，犹能驱役健儿千数百，突围决战，几歼敌师。五月十五日之役，曾军之不亡，天也。及城已破，复能以爱马救幼主，而慷慨决死，有国亡与亡之志。推古之大臣儒将，何以过之！项羽之乌骓不逝，文山之漆室无灵，天耶，人耶。吾闻李秀成之去苏州也，苏州之民，男女老幼，莫不流涕。至其礼葬王有龄，优恤败将降卒，俨然有文明国战时公法之意焉。金陵城中十余万人，无一降者，以视田横之客五百人，其志同，其事同，而魄力之大，又百倍之矣。此有史以来战争之结局所未曾有也。使以秀成而处洪秀全之地位，则今日之域中，安知为谁家之天下耶？秀成之被擒也，自六月十七日至十九日几三日间。在站笼中慷慨吮笔，记述数万言，虽经官军删节，不能备传，而至今读之，犹凛凛有生气焉。^①

最后，梁启超感叹由于太平天国的失败而埋没了太平天国的豪杰：

呜呼！刘兴骂项，成败论人。今日复谁肯为李秀成扬伟业发幽光者。百年而后，自有定评。后之良史，岂有所私？^②

这里，梁启超把李秀成在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的“慷慨决死”精神，看成超过项羽、文天祥等古代的文臣、儒将。他反对以成败论英雄，认为百年后的历史学家一定会为李秀成“扬伟业发幽光”，做出新的评价。

20世纪40年代，在延安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范文澜写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于1945年4月在《解放日报》上连载。文章在写到太平天国运动失败，李秀成被擒挥笔写下数万字的自述时，同样高度赞扬了他的英雄气概：

李秀成奉幼主洪福冲出城墙缺口，不幸散失，洪福逃往湖州，秀成藏匿民间，奸人向清营告密，被曾国荃捕获。曾国藩从安庆赶来，亲自审问。李秀成并无多言，只说：“速将纸笔来，吾当书之，吾史馆实录，为尔曹焚掠尽，吾不述，奚以传后。”他在囚笼中写天国始末，本人战绩数万字。并不隐讳天国亡国的原因，也不隐讳本人对天王的不满。这当然不是对敌人诽谤自己，而是想借最后一

^①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中华书局，1936年，第26页。

^②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中华书局，1936年，第26页。